

《孔子家語》的成書與可靠性研究

楊朝明

山東曲阜師範大學

孔子文化學院

提 要

《孔子家語》長期遭受冷落，被視為「偽書」。地下文獻的發現與研究，促使人們重新認識其成書與可靠性問題。據《家語》，孔子教學時弟子隨時整理記錄，聽到孔子教導後往往「退而記之」，這正是《家語》材料的最初來源。孔子逝世後，孔子裔孫子思領纂了《論語》與《孔子家語》。「家語」之名與《史記·孔子世家》中「弟子以時習禮其家」的「家」有密切聯繫，語，論也，言也。《孔子家語》應該就是「孔子家」的論說集或言論集。

孔子弟子彙聚「集錄」夫子言語後，其中一些材料經過孔安國《家語後序》所描述的流傳過程，輾轉至於西漢，由孔安國整理「撰集」成為今本。後來，該本經過孔氏家傳，到王肅時復出，由王肅作注成為通行本子。以後，歷代都有儒生、藏書家珍視該書，還有學者進行研究，呼籲重視。然而，在王肅注本問世以後的歷代流傳與研究之中，陸續出籠了對該書的懷疑、指責乃至認定其為「偽書」的觀點，疑古思潮盛行時更視其為典型的偽品。其實，這些觀點都有特定的學術思潮背景，如果認真分析，其結論實難成立。大批的出土材料也直接或間接證明，此書的價值非同尋常，《孔子家語》雖有後人「潤色」和撰集時的整理加工，但其出發點仍然是為了保留記錄「夫子本旨」。

關鍵詞：孔子家語、材料來源、孔安國、偽書、疑古思潮

《孔子家語》是專門記錄孔子及孔門弟子思想言行的著作。該書彙集了孔子的大量言論，再現了孔子與弟子、時人談論問題的許多場景，還有經過整理的孔子家世、生平、事蹟以及孔子弟子的材料。與《論語》相比，該書內容豐富，具體生動，首尾完備。只是該書長期遭受冷落，被視為「偽書」棄而不用！值得欣慰的是，地下文獻的發現與研究，使這部寶貴的典籍終於重見天日。有學者對該書進行了很好的探討，發現其中的記載極為珍貴，認為該書屬於「孟子以前遺物，絕非後人偽造所成」，從而「轟然打破」了原來的「成見」。¹與包括《論語》在內的衆多文獻相比，該書完全稱得上「孔子研究第一書」。但是，對這樣一部重要典籍，仍有許多學者存有種種疑慮，許多傳統看法仍具有很大影響。為此，本文謹對《孔子家語》的成書與可靠性問題試加梳理研究，不妥之處，敬請教正！

一、《孔子家語》的材料來源與成書

《孔子家語》記錄了孔子的言語事蹟，可是，這樣一部重要著作，為何命運如此多舛？欲弄清此問題，應首先瞭解該書的材料來源，瞭解其流傳與成書過程。

（一）《孔子家語》的材料來源

今本《孔子家語》附有漢孔安國的序文，根據孔安國序，《家語》為「當時公卿士大夫及七十二弟子所咨訪交相對問言語也，既而弟子各自記其所問焉，與《論語》、《孝經》並時，弟子取其正實而切事者，別出為《論語》，其餘則都集錄之，名之曰《孔子家語》。」根據我們的研究，孔安國的說法應該沒有問題。

孔子在世之時，長期從事教育活動。那時，在與孔子的交流過程中，弟子都有隨時記錄和整理孔子言語的習慣，比如，《論語·衛靈公》所記「子張書諸紳」。

其實，孔子弟子對孔子的言論都會及時進行記錄和整理。《孔子家語》中這樣的例子很多，比如：

1 龐樸，〈話說「五至三無」〉，頁71-76。

〈入官〉：「子張既聞孔子斯言，遂退而記之。」

〈論禮〉：「子夏蹶然而起，負牆而立，曰：『弟子敢不志之？』」

〈五刑解〉：「冉有跪然免席，曰：『言則美矣，求未之聞。』退而記之。」

〈正論解〉：「子貢以告孔子，子曰：『小子識之：苛政猛於暴虎。』」又曰：「孔子聞之，曰：『弟子志之：季氏之婦可謂不過矣。』」

一方面，孔子弟子將孔子的嘉語善言主動加以記錄；另一方面，孔子遇到一些重要問題，也常提醒弟子注意、記住。

在上引材料中，「志」、「識」都有「記」之意。如《禮記·禮運》記孔子曰：「大道之行也，與三代之英，丘未之逮也，而有志焉。」其中的「志」，在《孔子家語》的〈禮運〉篇中作「記」。〈禮運〉篇中，不論「記」還是「志」，都有「記載」、「記錄」、「志書」之義，朱彬《禮記訓纂》即引劉台拱解此字曰：「識也，識記之書。」

在與孔子交流中，弟子們學到了很多東西，可以想見，不少弟子都有自己整理保存著的有關記錄。那麼，這些材料是什麼時候彙聚起來的？又是怎樣彙聚起來的？

關於《論語》的成書時代，學界有過許多較好的研究，綜合學界的研究，結合新出土材料進行探討，《論語》應該是孔子裔孫子思最終主持編纂而成。²在此基礎上，我們進而推斷《家語》的編纂，也一定與子思有重要的聯繫。有一細節值得注意，即孔子去世後，孔子的衆弟子似乎難以承受失去老師所帶來的迷茫，他們曾經因為同門有若「似孔子」，而推舉他代替老師。但好像沒多久，因為有若畢竟不是老師而遭到否定。這也透露了孔子弟子在孔子去世後的分化，同時顯示出編纂孔子遺言已經被提上議事日程。據分析，在此及稍後的一段時期內，最有資格、有能力，又有號召力的就是曾子與孔子孫子思，《孔子家語》最終成於子思的領纂當無問題。³

這裏牽涉到一個重要問題，就是《孔子家語》為何被稱為「家語」？該書的

2 楊朝明，〈新出竹書與《論語》成書問題再認識〉，頁32-39。

3 楊朝明，〈孔門師徒與原始儒家學派的構成〉，收於楊朝明著，《出土文獻與儒家學術研究》，頁177-208。

最初形態如何？有人以為《家語》的名稱是後來才有的，我們認為未必如此。

《家語》孔安國序談到了荀子入秦所帶書籍，其中沒有「孔子家語」的名字，而稱為「孔子之言及諸國事、七十二弟子之言」；再說到秦始皇焚書時，才又冠以「孔子家語」之名。於是有人認為本來沒有「孔子家語」之名。後來，該書曾經流散，幾經周折，孔序說是「孔子家語而與諸國事及七十二弟子辭妄相錯雜」，直到最後，孔安國重新得到，分門別類，撰集成四十四篇的《家語》。在後孔安國序中，也沒有說先秦已有《家語》；子襄壁藏諸書有《家語》，清人孫志祖引徐鯤說指出：「此『家語』二字後人妄加也。」今也有人認為，孔衍奏言兩次講到孔安國「集錄孔氏家語」、「又撰孔子家語」，可見王肅也認為《家語》是由孔安國編成的，「家語」的名字可能與他有關。

其實，這樣的推斷是難以講通的。荀子入秦所帶書籍不止一種，沒有提及《孔子家語》的書名非常正常，這與戰國時期《家語》已經成書的說法並不抵觸。《家語·孔序》和孔衍奏言都說孔安國和《家語》有密切關係，這當然沒有問題。但如果說孔安國之前並沒有《家語》一書，看來難以成立。孔安國所編撰的《家語》在漢代一直沒有流行，但《漢書·藝文志》將《家語》列為《論語》十二家之一，這實際上間接證明瞭《家語·孔序》的說法，即認定了孔安國以前已經有《孔子家語》的存在。

《孔子家語》的名字，在《史記·孔子世家》已經透露了端倪。按照司馬遷的描述，孔子去世後，「孔子家」成為諸生演習講禮的場所，成為弟子後學緬懷、追思恩師的場所。其中記載說：

魯世世相傳以歲時奉祠孔子冢，而諸儒亦講禮鄉飲、大射於孔子冢。孔

子冢大一頃，故所居堂、弟子內，後世因廟。

有學者指出，其中的「冢」應為「家」之誤，這裏的三處「孔子冢」都應當作「孔子家」。⁴這與後面所說的「諸生以時習禮其家」正相對應，因為鄉飲、大射之禮也不能在「冢」上舉行。

弟子後學住進孔子原來的居堂中，除了按時舉行禮儀，他們還將各自整理保存的孔子的「講課記錄」彙聚到一起。我們可以想像，孔子的逝世，弟子後學失

4 韓兆琦，《史記箋證》曰：「按：句中『冢』字應作『家』」。引閻若璩曰：「『諸儒講禮鄉飲大射於孔子冢』，誤寫作『冢』，此『家』字與贊曰『以時習禮其家』合。」又引郭嵩燾曰：「此『冢』字應作『家』。」頁3272。此外，王叔岷《史記斟證》等也有此說。

去了恩師，也失去了自己精神的寄託，因此，他們便聚匯孔子言論，集中孔子學說，最終在孔子裔孫子思的主持下，共同編輯了《孔子家語》。

《說文解字》說：「語，論也。」《廣雅》說：「語，言也。」《孔子家語》應該就是「孔子家」的論說集或言論集，也是在「孔子家」中編輯而成的論說集、言論集，不難理解，《孔子家語》與《論語》在內容性質上完全相同。

（二）《孔子家語》的早期流傳

孔子弟子將各自記錄整理的有關孔子的材料彙聚「集錄」在一起，這應當就是《孔子家語》的原型。很明顯，在以後的日子裏，這個較為完全的「集錄」本會有不少儒家弟子後學進行傳抄，從而流行開來。

在《家語》的孔序⁵中，孔安國較為清楚地描述了《家語》的流傳情況，其中幾個比較重要的環節如下：

第一，戰國之世，孟子、荀卿守習儒學，《孔子家語》可能傳本不一。「孔子既沒而微言絕，七十二弟子終而大義乖，六國之世，儒道分散，遊說之士各以巧意而為枝葉，唯孟軻、荀卿守其所習。」

第二，荀卿入秦，以「孔子之語及諸國事、七十二弟子之言，凡百餘篇」獻秦昭王，《家語》由此傳入秦國；由於《家語》與諸子同列，故後來始皇焚書時得以倖免。在孔安國看來，先秦雖有不少《家語》材料在流傳，也一定會有不少人在傳習《家語》，但荀卿畢竟「守其所習」，而且，將《家語》傳到秦國並且使之流傳到漢朝，都是荀卿的功勞。這樣，就保證了《家語》材料的「純正」，避免了「遊說之士各以巧意而為枝葉」的影響。

第三，漢初劉邦滅秦後，「悉斂得之，皆載於二尺竹簡，多有古文字」，後為呂后取而藏之。呂氏被誅亡以後，《家語》散入民間，遂出現了《家語》的多種本子。〈後序〉曰：「好事者或各以意增損其言，故使同是一事，而輒異辭。」

孔安國所言「悉斂得之」，說明漢滅秦時所得到的《孔子家語》是一全本。他還說這些材料「皆載於二尺竹簡，多有古文字」。這些描述，非親見者難以言之。孔安國見到這些竹簡是沒有問題的，因為從漢朝得到這些材料，到呂后得到

5 孔安國，《孔子家語·後序》，見《影宋蜀本孔子家語》。

這批材料，再到他本人那個時期，這些材料一直是在流傳著的。

第四，景帝末年募求天下書，那時，京師士大夫皆送官，得呂氏所傳《家語》，不過，這些材料「與諸國事及七十子之辭妄相錯雜」，「與《曲禮》衆篇亂簡合而藏之秘府」。

這裏透露出來的信息十分重要。景帝末年募求圖書時，官府中一定集中了不少《孔子家語》的材料，也就是說，在景帝時，秘府已經有了《孔子家語》一書。當然，這部《家語》（或這些《家語》材料）還存在著不少問題，因為這些可能已經不單純是《家語》的竹簡，而是與其他相關記載「妄相錯雜」。

（三）孔安國寫定《孔子家語》

在西漢秘府中，《孔子家語》雖有收藏，但因為與其他材料混亂地存放在一起，僅由「掌書」負責掌管而已，因此，一定會嚴重影響到該書的利用。正因如此，後來才出現了兩個問題：第一，官家圖書中的《孔子家語》後來沒有流傳下來；第二，孔安國設法重新整理了《孔子家語》。

據《漢書·藝文志》，西漢秘府中的《孔子家語》有二十七卷，雖然這些材料可能後來還曾經有人使用，但因為該書存在一定的問題，所以當孔安國的孫子孔衍奏請將孔安國整理後的《家語》立於學官時，劉向本人也是同意的。再到後來，曾經收藏在秘府中的這個《家語》還可能被整理傳抄過，不過，最終可能還是不及孔安國整理的本子而歸於亡佚。

漢武帝元封年間（前110-105年），孔安國在京師為官。作為孔子後裔，他瞭解到《孔子家語》在秘府中的狀況，很擔心「先人之典辭將遂泯沒」，於是，他設法得到這些材料，抄錄整理，「撰集」而成為四十四篇的《孔子家語》。這部著作流傳至今，這便是我們今天所看到的《家語》本子。

孔安國敘述自己「撰集」《家語》的經過說：

因諸公卿大夫，私以人事募求其副，悉得之，乃以事類相次，撰集為四十四篇。又有曾子〈問禮〉一篇，自別屬《曾子問》，故不復錄。其諸弟子書所稱引孔子之言者，本不存乎《家語》，亦以其已自有所傳也，是以皆不取也，將來君子不可不鑒。⁶

6 孔安國，《孔子家語·後序》。

孔安國通過私人關係取得了《家語》的材料，進行整理。他搜求材料，明確說是「悉得之」，看來，這些《家語》材料應該是比較完備的。在此基礎上，他按照事情的類別進行編次，分為四十四篇。從今本《家語》看，各篇之間既有內在邏輯聯繫，也有重新編次的痕跡。

比如，本書以〈相魯〉為第一篇，從孔子仕魯開始；接著是〈始誅〉，記孔子為大司寇時事；第三篇〈王言〉乃孔子與曾子的對話，這不僅僅是因為子思為曾子弟子，就像《論語》中曾子的地位顯得非常特殊一樣，《孔子家語》因為子思師事曾子，而格外重視曾子的言論，更重要的是，孔子倡言王道，該篇所謂「王言」，乃是記述孔子的「王」天下之言。在前三篇之後，第一卷中的各篇都是孔子回答諸侯國君主要是魯哀公的談話；然後，各篇才記述孔子與弟子們的論說。後面依照內容的不同而有所區分，如在第八卷中，將冠禮、廟制、音樂等歸在一起，顯然有一定考慮。在基本排列完有關材料後，第九卷將孔子弟子、孔子家世、孔子臨終情況分別單篇敘述，又將孔子的一些零散言論作為「正論」列為一卷。最後一卷三篇都是孔子與弟子關於曲禮的問答。

孔安國對原來的材料進行編次時，畢竟有些不好歸屬，所以在今本《家語》中不難看到本應不屬同篇的材料被歸到了一起。他的重新編次，當然已經與最初時期的次序不同。但是，不論其編次如何，他都是盡力使這些材料的順序符合一定邏輯。毫無疑問，孔安國的編次是對《家語》的再加工過程，但可以肯定的是，他一定會盡力保存《家語》材料之真，也就是說，儘管他進行了重新編次的工作，該書材料的真實性卻並不受到影響。

還有一點，孔安國說到呂氏被誅亡後，《孔子家語》散在民間，從而使《家語》出現了「同是一事而輒異辭」的現象，這顯然是「好事者或各以意增損其言」所造成的。這應當是孔安國在整理編次《家語》時發現的問題。我們推測，他就一定會在「錄副」時有所考慮，有所去取抉擇。很顯然，孔安國不僅為我們保留了孔子與早期儒學研究的寶貴材料，而且進行了認真的分析梳理，他對於《孔子家語》的整理功不可沒！

二、《孔子家語》的家傳、注解與「偽書」問題

談《孔子家語》，不能不談該書的真偽之爭。長期以來，《家語》被視為「偽書」的典型代表，嚴重影響了該書的研究和利用。

《家語》「偽書」說的形成，與其成書與流傳問題緊密相聯。今本《家語》經孔安國寫定後，經歷了一個家傳的過程，後來，三國時期的王肅得到該書，並為此書作注，使該書開始流行。然而，由於今本《家語》之外可能還有原來官府的所謂《家語》本子存在，而且，經過孔安國的整理，捨棄了其中有關的一些材料，比如他曾經提到的「曾子《問禮》一篇」、「諸弟子書所稱引孔子之言」等等，這些材料被人作為《家語》進行使用，從而影響到了後代學者對今本《家語》的認識。於是，後來有人認為《家語》存在嚴重問題，再到後來，《家語》居然成了「偽書」，人們不是以為孔安國「作偽」，就是認為王肅「作偽」。清代以後，由於疑古思潮的嚴重影響，《孔子家語》作為「贗品」，在有的學者心目中已經簡直不值一提，而以《家語》為真，認為應當認真對待該書的聲音，幾乎完全被疑古大潮所淹沒。

（一）《孔子家語》的孔氏家傳

在漢武帝時期，孔安國雖然為官於朝，按照乃孫孔衍所說，他也是「以經學為名，以儒雅為官，贊明道義，見稱前朝」，但是，他寫定《孔子家語》，主觀目的卻在於保存「先人之典」，帶有「私」的性質，所以，儘管他在編次《家語》上下了很大功夫，但從其寫定，直到三國王肅之時，在三、四百年的時間裏，《家語》卻是一直作為家傳圖書而存在。

漢代，今本《家語》僅僅作為家傳本流傳，一個最重要證據便是其不像被編入《禮記》、《大戴禮記》等書中的材料那樣，動輒就避漢諱，不像大小戴《禮記》那樣帶有明顯的漢人編輯的痕跡。

在《四庫全書》中，《孔子家語》本屬於禦題影宋鈔本，乃毛晉汲古閣收藏的本子。在該版本的後面，不僅有孔安國《孔子家語》的〈後序〉，而且有孔安國後人所撰〈後序〉，這兩篇序文將孔安國以後《家語》在漢代的家傳情況介紹得比較詳細。

需要辨明的是，不少學者誤解孔安國後人所撰〈後序〉，認為其中的記載自相矛盾，由此懷疑該文的可靠性。人們的誤解主要是關於《孔子家語》是否出於孔壁，有關情況序文中是這樣說的：

子襄以好經書，博學，畏秦法峻急，乃壁藏其家語《孝經》、《尚書》及《論語》于夫子之舊堂壁中。……天漢後，魯恭王壞夫子故宅，得壁

中《詩》《書》，悉以歸子國。子國乃考論古今文字，撰眾師之義，為《古文論語訓》十一篇、《孝經傳》二篇、《尚書傳》五十八篇，皆所得壁中科門本也。又集錄《孔氏家語》為四十四篇。

序文在下面引述孔衍奏言的時候又說：

時魯共王壞孔子故宅，得古文科門《尚書》、《孝經》、《論語》，世人莫有能言者，安國為改今文，讀而訓傳其義。又撰次《孔子家語》。

人們看到序文中「乃壁藏其家語《孝經》、《尚書》及《論語》于夫子之舊堂壁中」，以為「家語」就是《孔子家語》，其實，此處所言的「家語」乃是「孔子家的言語論說書籍」的一個泛稱，包括被壁藏的「《孝經》、《尚書》及《論語》」之類的所有材料。序文中並沒說子襄壁藏的書籍中有《孔子家語》。這與《漢書》〈藝文志〉、〈魯恭王傳〉等材料中的相關記載完全一致。

孔安國曾經整理孔壁藏書，但在兩篇序文中，都同樣沒有說他整理的書籍包括《孔子家語》。孔安國序文明確敘述《家語》的流傳過程，絲毫沒有說它與孔壁有什麼聯繫，在孔安國後人的序文中，也同樣都是將孔安國整理孔壁藏書與「集錄」或「撰次」《家語》分開來說的。

孔安國後人的序文到底出於何人之手，由於材料缺乏，已經很難知曉，但其中所敘述的有關情況是值得充分重視的。該序首敘從孔子到孔安國十二世的孔氏世系，又全文引述孔安國之孫孔衍給漢成帝的上書。無論是序文的介紹還是孔衍的上書，都稱孔安國整理《孔子家語》以後，該書並沒有獻出來呈交朝廷。

據介紹，孔安國整理《家語》後，由於遇到「巫蠱事件」，未來得及呈獻。不久，安國被調離京師，後來去世，此事就被擱置下來，這便是安國後人序文中所說的「寢不施行」。後來，漢成帝詔劉向校定眾書，忽視了孔安國校訂的各書，遂使這些書籍仍然「各廢不行於時」，其中自然包括《孔子家語》，所以，孔衍希望朝廷能夠將這些重要的典籍材料「記錄別見」，他說：「光祿大夫向，以其為時所未施行，故《尚書》則不記於《別錄》，《論語》則不使名家也。臣竊惜之。且百家章句，無不畢記，況孔子家古文正實而疑之哉！」

孔衍所說的「孔子家古文」，既包括孔壁藏書，也包括《孔子家語》。孔安國在序文中曾經說到，他所抄錄而來的《家語》，本來「皆載於二尺竹簡，多有古文字」。雖然孔安國整理的《家語》「未施行」，但戴德、戴聖在自己編輯的《禮記》、《大戴禮記》中，卻收錄了《家語》的材料，於是，人們反而不知道《家

語》而僅僅知道他們編輯的書籍了，這正如孔衍所說：「今見其已在《禮記》者，則便除《家語》之本篇，是爲滅其原而存其末也」，因此，孔衍視其爲「近世小儒」，並在奏言中對他們加以指責，批評他們「以《曲禮》不足，而乃取《孔子家語》雜亂者，及子思、孟軻、荀卿之書以裨益之」的做法。

可惜的是，孔衍奏言雖得到了成帝的允許，但還沒有來得及最終研究確定，成帝就一命嗚呼。與之同時，掌管校書的劉向也因病去世，其最終結果還是「遂不果立」。

認真品味兩篇序文，綜觀整個過程，不難看出，無論孔安國還是孔衍，他們都是希望《家語》能夠立於學官，流行於世，但是，由於非常巧合的種種變故，《家語》在漢代始終都是以家學的形式流傳。孔安國之後，《孔子家語》傳到了其孫孔衍，孔衍希望朝廷「記錄別見」未成，《家語》自然繼續家傳。孔衍之後，有人作了包括了孔衍「奏言」的《孔子家語》後序，此人顯然也是《家語》的傳承之人。那麼，這篇序文出於何人？在序文中，作者直接引述了孔衍「奏言」，而衍只提到劉向，其中也並沒有補述劉歆等人如何看待《家語》。根據序文的語氣、表述，不難推測此人距離孔衍不遠，他即使不是孔衍的同一輩人，也是他的不遠的後輩。

直到三國時孔猛之時，《家語》家傳的歷史才由於被獻給王肅而結束。《家語》〈王肅序〉說：「孔子二十二世孫有孔猛者，家有其先人之書，昔相從學，頃還家，方取以來。」按照這個說法，在王肅注解《家語》之前，孔氏家藏的這本《孔子家語》一直沒有能夠流行於世。幸好孔猛爲王肅弟子，而書中所言與王肅所論「有若重規疊矩」，《孔子家語》才在王肅整理之後流行起來，這都證明此前孔安國所整理的本子僅僅具有孔氏家傳本的形式。

（二）王肅注解《孔子家語》

今本《家語》在孔安國寫定後，經過兩漢時期的家傳過程，終於在三國魏王肅之時公佈於世。作爲經學家，王肅的觀點有一些與當時流行的鄭玄之學不同。孔子二十二世孫孔猛從師於肅，他將家傳的《孔子家語》拿給王肅看，而王肅看到這些材料與自己的學說暗合，且可以作爲駁正鄭學的根據，他不希望這些材料復歸於無聞，於是爲該書作注，使之行世。王肅爲《家語》作注，是《孔子家語》正式研究的開端，王注也就成爲《家語》的第一個注本，他爲今本（孔安國

本)《家語》的流行做出了特殊貢獻。

王肅反對鄭學，絕非故意標新立異。但在王肅時代，世人已經對他多有誤解，對此，王肅說：「自肅成童始志於學而學鄭氏學矣。然尋文責實，考其上下義理不安違錯者多，是以奪而易之。然世未明其款情，而謂其苟駁前師，以見異於人。」事實上，到三國之時，鄭學已經顯露出了弊端，尤其是其煩瑣與神秘性的弊病，已經與時代不合，因此，「魏晉之際，清談前期反鄭之說蔚起，蔣濟嘗難鄭玄注《祭法》，王粲有難鄭玄《尚書》事，虞翻奏鄭玄解《尚書》違失」，⁷在這些反對鄭玄的學者中，王肅不過是比較有影響的罷了。

學術總是在不斷發展前進。當年，鄭玄會通古今，遍注群經，對經學的發展作出了重要貢獻，從而奠定了他在經學史上的重要地位。到王肅時期，鄭學已經風行五十多年，其缺失陸續呈現，在此背景下，王肅起而糾正鄭玄之失。王肅說：「予豈好難哉？予不得已也。聖人之門，方壅不通，孔氏之路，積棘充焉，豈得不開而辟之哉？」王肅與鄭玄在學術上的分歧焦點，《晉書·禮儀志》中有明確記載：「三年之喪，鄭云二十七月，王云二十五月；改葬之服，鄭云服總三月，王云葬訖而除；繼母出嫁，鄭云皆服，王云從乎繼寄育乃爲之服；無服之殤，鄭云子生一月哭之一日，王云以哭之日易服之月。如此者甚衆。」當然，他們之間的分歧並不止此。

王肅反對鄭玄，一是撰《聖證論》「以譏短玄」，一是撰《尚書駁議》、《毛詩義駁》、《毛詩問難》、《毛詩奏事》以難鄭，一是借《孔子家語》以駁斥鄭玄。在駁難鄭玄過程中，《家語》可以說是「一把利劍」，其「殺傷力」可想而知。對此，王肅也不諱言，他對於自己能夠得到孔氏家傳的《孔子家語》也是喜出望外的。他說：

孔子二十二世孫有孔猛者，家有其先人之書。昔相從學，頃還家，方取以來。與予所論，有若重規疊矩。昔仲尼曰：「文王既歿，文不在茲乎？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于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言天喪斯文，故令已傳斯文於天下。今或者天未欲亂斯文，故令從予學，而予從猛得斯論，以明相與孔氏之無違也。

不言而喻，一種新的學術思想要在原來影響很大的學術思潮中誕生，需要經過一

7 賀昌群，《魏晉清談思想初論》，頁20。

個艱難的奮爭過程，王肅處在這樣的過程中，竟然有關於孔子的新的材料可以證成己說，不難理解王肅一定會興奮不已。所以王肅說：「斯皆聖人實事之論，而恐其將絕，故特爲之解，以貽好事之君子。」王肅遂傾力爲《家語》作注。

值得特別注意的是，王肅在《家語注》中還多處指正《家語》的錯誤。據統計，在《家語注》中，王肅對《家語》記載表示懷疑或對其進行錯誤勘正的共有十九處。如〈王言解〉，原文爲「千步爲井，三井而埒」，王肅據前後文注曰：「此說里數，不可以言井，井自方里之名。疑此誤。」又如〈六本〉：「榮聲期行乎郕之野」，王肅注：「聲，宜爲啓。或曰榮益期也。」⁸如此等等，王肅的客觀態度於此可見一斑。

（三）今本《家語》的流傳與研究

王肅以前，《孔子家語》雖然沒有受到漢代朝廷的重視，未立於學官，但該書卻並沒有什麼可以懷疑之處。事實上，歷代都有儒生、藏書家珍視《孔子家語》，看到該書非同尋常的價值，並且還有學者細緻研究該書，呼籲重視《孔子家語》。然而，與之同時，在王肅注本問世以後的歷代流傳與研究之中，陸續出籠了對該書的懷疑、指責乃至認定其爲「偽書」的觀點。其實，這些觀點的出現都有其特定的學術思潮背景，認真分析種種懷疑、否定《孔子家語》觀點，其結論都難以成立。

首先，馬昭聲稱王肅「增加」《家語》。

王肅反對鄭玄，屬於經學內部的自我變革，他並非「一意」反鄭。王學上承兩漢經學，下啓魏晉玄學，順應了理性發展的趨勢，其所具有的過渡性恰恰是其價值所在。

王肅注解《孔子家語》以行世，此本甫出，鄭玄後學馬昭就立刻攻擊王肅增加了《家語》，始給今本《家語》蒙上了一層陰影：

《禮記·樂記》：「舜彈五弦之琴，以歌南風。」鄭注：「南風，長養之風也，以言父母之長養也。其詞未聞。」孔穎達疏：「案：《聖證論》引《尸子》及《孔子家語》難鄭云：『昔者舜彈五弦之琴，其辭曰：南風之熏兮，可以解吾民之愠兮；南風之時兮，可以阜吾民之財兮。鄭

8 王政之，《王肅《孔子家語》注研究》。

云：其辭未聞，失其義也。』今案馬昭云：『《家語》，王肅所增加，非鄭所見。』又『《尸子》雜說，不可取證正經，故言未聞也。』⁹

馬昭云：「《家語》，王肅所增加，非鄭所見。」《通典》卷九十一還引馬昭曰：「《孔子家語》之言，固所未信。」

這是《家語》偽書論者常常引證的材料，其實，「其辭未聞」對鄭玄來說是事實；王肅引《尸子》、《家語》給出《南風》歌詞也是事實。如果說《家語》中的部分內容是王肅蓄意增加，但是《尸子》在《漢志》中記載明確，雖位列雜家，亦乃先秦古籍，其匯融諸家實為時代潮流，怎能說「《尸子》雜說，不可取證正經」呢？關鍵是「沒有人證明《尸子》也是王肅偽造！」¹⁰雖然有學者提到《隋書·經籍志》載《尸子》二十卷《目》一卷，注云：「梁十九卷，其九篇亡，魏黃初中續。」由此認為《南風》歌詞所在的《綽子》應在續作之列。¹¹實際這無關宏旨，因為即使《尸子》的部分篇章是魏黃初續作，但至少應承認不是王肅所作。

至於認為從《尸子》到《家語》，王肅又加上「南風之時兮，可以阜吾民之財兮」一句駁鄭，則顯示了某種成見，也似乎低估了王肅。既然鄭玄是「其辭未聞」，王肅據《尸子》駁鄭就足夠了，何必自己再加一句以至畫蛇添足？清錢馥由馬昭之言論斷王肅在《家語》原來二十七篇的基礎上增加了十七篇，認為篇卷無別，則屬無端臆測。¹²歷史上雖有以篇為卷的事例，但錢馥卻是以王肅改造《家語》為前提而論，當然不足為據。至此，可以清楚地看到，由馬昭肇始的王肅偽造《家語》說的基礎已不存在。古人以所謂「證據確鑿」引用的馬昭之語，不過是出於門戶之見的臆測。

《禮記·樂記》疏所引馬昭的話可以理解為《孔子家語》後出，所謂「王肅所增加」未必一定是王肅所「偽作」，所以馬昭後來又說「非鄭所見」。但無論如何，馬昭的觀點對後來的影響卻不可低估，所謂「增加說」歷代都有人相信，有人由此認為王肅在注《家語》時增加了本來沒有的東西以反對鄭學，並且一直持續至今。作為鄭玄的後學，馬昭想方設法維護鄭玄是可以理解的。但是，馬昭所

9 （唐）孔穎達，《禮記正義》，頁1099。

10 胡平生，〈阜陽雙古堆漢簡與《孔子家語》〉，頁527。

11 王承略，〈論《孔子家語》的真偽及其文獻價值〉，頁14-18。

12 錢馥，〈孔子家語疏證序〉，孫志祖撰，《家語疏證》。

說《家語》「非鄭所見」確是事實，而「王肅所增加」，「固所未信」則純屬推測之語。

後世許多學者接受王肅「偽作」《家語》乃至更多的著作，其認識的起點也都是一個，那就是王肅「反對鄭玄」。稱王肅反鄭固無大錯，但說王肅「故意與鄭玄作對」就未必準確。然而，持此看法的卻大有人在。例如，孫欽善在其《中國古文獻學史》明確認定王肅在古文獻學上有兩個特點：一是專與鄭學作對，得失兼有；一是多造偽書。¹³ 而此論代表了相當多人的看法。

可是，有學者研究了漢末以來的學術史，指出那時的主要傾向乃是「唯義是從」，因此，鄭玄便於今古文擇善而從，不專主一家。後世學者多謂王肅存心與鄭學作對，其實，鄭學、王學有不少相同的見解。如果是存心作對，兩者相同的見解又如何解釋呢？在反鄭學的人看來，鄭學是「遠本離直」的，所以王肅認為自己是在「撥亂反正」。王肅所受的學術影響基本上都是反鄭學陣營的，耳濡目染之際自然而然就形成與鄭學如此多的歧異，後人因為王學與鄭學歧異較多，而認定王肅是存心立異，顯然不當。¹⁴ 實際上，漢末以來所宣導的獨立思考傾向，在王肅注解《孔子家語》的態度上已明顯地體現出來，所以他才「撰經禮申明其義，及朝論制度，皆據所見而言。」

在王肅所注解的其他書籍中，有一些是與《家語》記載不同的，如《家語·郊問》記載孔子主張魯惟一郊。而《禮記·郊特牲》孔穎達疏曰：「魯之郊祭，師說不同：崔氏、皇氏用王肅之說，以魯冬至郊天，而建寅之月又郊以祈穀。」《家語》與王肅觀點截然不同。又如廟制，《家語·廟制》曰：「天子立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七。」鄭玄認為天子七廟，太祖廟一，文王、武王廟各一。亦即二祧，親廟四，合而為七廟。王肅在《聖證論》中，以為二祧者為高祖之父，高祖之祖。加上太祖及四親廟為七廟。文王、武王之廟在七廟之外。¹⁵ 按王肅說，則天子應有九廟。這顯然與《家語》記載不一致，如果王肅「偽造」或「增刪」《家語》而專與鄭玄作對，他為什麼還要假造對自己論點不利的材料？他何不將《家語》中十分不利於自己的關鍵材料直接刪除？

在學術上，馬昭可能有自己的一些個性或偏見，漢末以來雖然主流傾向是「唯

13 孫欽善，《中國古文獻學史》，頁119-220。

14 王志平，《中國學術史·魏晉南北朝卷》，頁142-144。

15 王肅，《聖證論》，馬國翰，《玉函山房輯佚書》，頁208-209。

義是從」，但馬昭或許是個例外。有學者指出：「馬昭是很強烈地維護師道尊嚴的人，但更準確地說馬昭是爲了維護師嚴而非爲了維護道尊。如果真要維護道尊的話，就應該平心靜氣地承認王肅所駁正中鄭注之失，而不應該巧設詭辭，百般彌縫。從這一點上說，馬昭所論距離『惟義是從』、『惟義所在』是很遙遠的。」¹⁶同爲鄭玄後學高足，就有人更爲客觀，例如，魏博士田瓊就依據《孔子家語》以議禮，如果大家都懷疑《家語》，相信王肅注《家語》是爲了攻擊鄭學而肆意增加內容，田瓊肯定不會引用《家語》。

清代還有人提出了另外的疑問：如果不是有問題，那王肅爲何不將這麼一部重要的著作奏立學官呢？難道王肅心中有鬼，擔心事情敗露？范家相就這樣認爲，他說：「今《家語》出於魏明帝之時，其（指王肅）所作《尚書》、《詩》、《三禮》、《論語》及《易》傳皆立於學官，而《家語》獨未經奏上。設此四十四篇果出於孔氏，豈肯不表章之以聞于朝，毋亦有鑒於張霸之僞書而有所不敢耶？」¹⁷這很有些「欲加之罪，何患無辭」的意味。這麼重要的書籍，孔子後裔數次努力，多次希望奏上都沒有成功，怎麼王肅之時就不能有其他的原因，爲什麼就意味者王肅作僞呢？如果說王肅只是擔心事情敗露，那麼他爲此書作注後依然使該書流行開來，這與「表章之以聞於朝」而立於學官又有什麼不同呢？

不論王肅對《孔子家語》「僞造」還是「增刪」，就應當屬於王肅與作爲他的弟子的孔猛「共同作案」。試想，作爲一位有影響的學者，王肅難道會愚蠢或者無恥到這樣的地步？難道他爲了攻難鄭玄，就甘願做出這樣的事情？他就不怕作爲孔子後裔的孔猛或者孔氏後人揭出事情的真相？

看來，不僅王肅「僞造」或者「增刪」《家語》的說法難以成立，馬昭所謂《孔子家語》爲王肅「增加」的說法，也沒有充分的根據可以認定其是指王肅隨意增加了《孔子家語》的內容。

第二，顏師古注云「非今所有《家語》」。

王肅注解《孔子家語》後，這個四十四篇的《家語》本子便流行開來，因此，在隋唐二代的正史中著錄的《孔子家語》都是王肅的注本。然而，在唐代，《孔子家語》是否還有其他的本子，卻是一個具有爭議的問題，因爲唐初顏

16 王志平，《中國學術史·魏晉南北朝卷》，頁147。

17 （清）范家相，〈讀家語雜記〉，范家相，《家語證訛》。

師古似乎看到過王肅注本以外的《家語》本子，他在《漢書·藝文志》的「《孔子家語》二十七卷」下注曰：「非今所有《家語》」。顏注告訴我們：唐代的《孔子家語》與漢代的不同。顏師古為什麼說《漢志》二十七卷本的《孔子家語》是「非今所有《家語》」呢？依據是什麼？顏師古並沒有提出更詳盡的說明。

對於小顏的說法，後人有不同說解：

一是認為顏師古沒有搞清楚篇卷的分合問題，認為《漢志》二十七卷本的《孔子家語》應該就是今本。

二是認為顏師古的說法沒有根據，他的看法只是他的臆測而已。

三是認為顏師古一定看到了靠得住的《孔子家語》，從而認為這可以證明王肅注本屬於「偽書」。

關於第一種看法，需要注意的是顏師古已經明確地說到「非今所有」。從《漢志》所載的二十七卷，到《隋志》所記二十一卷，其間雖然只是「七」與「一」的區別，但《隋志》畢竟又明確地說這個二十一卷本是「王肅解」。對於《孔子家語》的卷數，諸多學者認為唐以前均為二十七卷，唐以後合併為十卷。《隋志》著錄為「二十一卷」，「一」應為「七」之誤。¹⁸但考於古籍，「一」、「七」混誤的情況極少，從音韻和訓詁方面來看它們也不易混誤。

歷史上，由於古書書寫材料的變化，古書傳抄過程中卷帙的分合是十分正常的現象。一般說來，隨著書寫材料不斷進步，每卷所包括的內容增大，一部書的卷數往往有所減少。《孔子家語》王肅注本由《隋志》的二十一卷到兩《唐志》、乃至《宋史·藝文志》等史志著錄的十卷，其原因可能正是如此。而從《漢志》的「二十七卷」到《隋志》「二十一卷」情況則與之不同。

關於第二種說法，以顏師古為臆測，恐亦為臆測。時至唐代，書籍的傳流恐怕已經與秦漢之際的情況有所不同。從先秦古文到西漢時期寫定今文，在不少書籍的古今比較中很容易看出，「各以意增損其言」，「同是一事而輒異辭」的情況不難見到，而對於文字的整飾、寫定之時進行意義訓釋的更為普遍。所以，同為一書，也可能存在字句的不同。顏師古的時候，恐怕已經不是這樣，更何況是「二十七卷」與「二十一卷」之間的區別。作為一位博學的學者，顏師古所言

18 周洪才，《孔子故里著述考》，頁306。

不應當是空穴來風，在確實難以弄清楚的情況下，我們不宜匆忙下結論。

關於第三種說法，依照常理，如果顏師古能夠看到不同於王肅注本的《孔子家語》，史志之中應該有所著錄，而事實上，除了《漢志》，其他史志無一記載這個「二十七卷」的本子。至於顏師古說到有別於王肅注本的《家語》內容或者材料，這種可能性是存在的。因為以前曾經有官本存在，而且與顏師古大致同時期的司馬貞《史記索隱》所引《家語》內容，今傳本就或有或無，也說明瞭《家語》流傳的一些問題。

但是，有一個事實必須注意，那就是司馬貞《索隱》所引《家語》大致與今本相同。該書共引《家語》六十七條，其中，與今本《家語》相異者共十九條，為今本《家語》所無的共四條，其餘除《孔子世家》關於孔子家世記載所引《家語》與今本《家語·本姓解》略有差異之外，則基本上都是因字詞傳抄而產生的不同，如〈仲尼弟子列傳〉敘「公冶長」引《家語》曰：「魯人，名萇。」今本《家語》記為：「魯人，字子長。」在流傳過程中，《家語》或有衍缺，或以經文竄入正文，這屬於古籍流傳過程中的常見現象。看來以此作為王肅注本屬於「偽書」的證據，並沒有太大說服力。

但是，第三種說法的客觀影響卻很大，由於顏師古的說法，人們便由此而懷疑王肅及其所作的注文。如宋代章如愚撰《群書考索》，在卷十中引《中興書目》曰：「按班固《藝文志》：《孔子家語》二十七篇。顏注云：非今所有《家語》。則以肅之所注者在可疑也。」

既然以上三種認識都存在一定問題，那麼真相到底如何？我們認為，顏師古所言一定有他的根據，他可能至少發現了一定的線索，所以他才認定《漢志》所著錄的本子「非今所有《家語》」。我們推測，《漢志》的「二十七卷」本《家語》，應該是與孔安國四十四篇本不同的另一本子，這是劉向等人所著錄的藏於中秘的官本，只是這個官本可能比較粗疏，遠遠不及孔安國本。

當初，孔安國整理編次《孔子家語》，雖然只是以家傳的形式流傳，但是，他所依據的材料卻一直藏在秘府。正如孔安國在〈孔子家語後序〉中所說：

孝景皇帝末年，募求天下遺書，於時京師士大夫皆送官，得呂氏之所傳《孔子家語》，而與諸國事及七十子辭妄相錯雜，不可得知，以付掌書，與《曲禮》眾篇亂簡合而藏之秘府。

在這裏，有兩點是非常明確的：其一，這批材料數量不少。因為「京師士大夫皆送官」，一個「皆」字很能說明問題。其二，這批材料很是雜亂。《家語》屬於古文，沒有單獨存放，居然還「與諸國事及七十子辭妄相錯雜」，本來就難以理清的一堆亂簡，竟然又被「掌書」的官吏搞得更亂，「與《曲禮》衆篇亂簡合而藏之」。藏在秘府的這些材料，孔安國不僅看到了、得到了，並且「求其副」、「悉得之」。孔安國全部得到後，「以事類相次」，進行了一番別擇去取的工作，那麼他的四十四篇本《家語》應該是他自己「撰集」的結果，秘府本肯定不會是這樣的面貌。相對於秘府中的材料，孔安國的本子在數量上少了很多，因為經過他的分析研究，既有「不復錄」的內容，也有「皆不取」的部分。

但是，劉向等人在整理秘府中的古書時，面對這一批十分雜亂的材料，並沒有像孔安國那樣進行細緻整理，最大的可能是，他們進行了粗略的分類，以為這些材料都屬於「孔子家」一類的論述，便編輯成了二十七卷，統稱之為《孔子家語》了。這樣，官本的《孔子家語》不僅卷數較多，並且在內容上也有不少超出了今本《家語》。

如果以上的判斷有一定的推測成分，但有一點可以肯定，那就是這批材料一定散亂不整、雜亂無章。正是由於這個原因，孔安國才對他們編次、撰集；也是由於這個原因，劉向僅僅著錄其書，並沒有繼續整理，漢代沒有列於學官，而劉向在《說苑》等書中卻使用了其中的材料；還是由於這個原因，在王肅注解的《孔子家語》本子問世後，這個所謂的「二十七卷」本子便歸於無聞。這樣，顏師古所說「非今所有《家語》」也就不難理解了。

第三，王柏以王肅「雜取」各書割裂織成。

儘管馬昭、顏師古等人的說法影響到了後人對《家語》的看法，但他們誰也沒有認為王肅偽造了《孔子家語》。正式提出王肅偽造說的是宋代的王柏。他說：「今之《家語》十卷，凡四十有四篇，意王肅雜取《左傳》、《國語》、《荀》、《孟》、《二戴》之緒餘，混亂精粗，割裂前後，織而成之，托以安國之名。」¹⁹從此以後，王肅偽造說便開始流行開來。

據王柏自己的說法，他是在讀朱熹《中庸集注》時，曾經以《家語》證《中庸》，發現所謂兩者相校，「有缺有衍」，於是產生懷疑，並對朱熹關於《家語》

19 (宋)王柏，《魯齋集》，卷9，〈家語考〉。

的看法也產生疑問。朱熹認為《家語》「雖記得不純，卻是當時書」，又說「其書雖多疵，然非肅所作」。²⁰於是，王柏找來《家語》，進行研究，但是他研究的結果卻認為「有大可疑」。

我們曾經就今本《家語》與現存於《禮記》中的《中庸》進行比較。今本《中庸》有一部分見於《孔子家語》，即朱熹所分章的《中庸》第二十章除了「博學之」以後一小部分外的前面大部，與《家語》卷四中的〈哀公問政〉篇基本相同。我們認為是戴聖編輯《禮記》時，將〈哀公問政〉的內容納入了《中庸》。²¹

朱熹已經指出了二者的關聯，他在注解《中庸》時說：「《孔子家語》亦載此章，而其文尤詳。」他還說：「『博學之』以下，《家語》無之，意彼有闕文，抑此或子思所補文也歟！」²²不過，朱夫子專注於今本《中庸》的義理，對於《家語》與《中庸》的內容互見，並沒有繼續追問。將《家語·哀公問政》與《禮記·中庸》的相應部分對比，可以說明孔衍奏言不虛。實際上，《家語》與《禮記》眾多的相應部分都是如此，如果不帶有偏見或先入之見，一定看不出所謂《家語》雜取《禮記》的痕跡。²³事實正好相反，其他文獻中的許多材料都來自《家語》，至少能看出《家語》比《禮記》更為古樸。事實上，《大戴禮記》等許多與《孔子家語》相關的內容同樣如此。例如，在相關部分中，《家語》的「爵其能」、「舉廢邦」在《禮記》中分別被改成了「尊其位」、「舉廢國」，這樣的改動不難理解。

漢代，「非劉氏不王」，只有極少數異姓功臣封侯，封賜爵位是一個敏感的話題，根本談不上什麼「爵其能」，《禮記》編者改其為「尊其位」，在當時則無不可。至於「舉廢邦」變成「舉廢國」，自然是為了避高祖劉邦的名諱。戴聖編訂《禮記》，哪裡能夠允許「廢邦」二字赫然存於禮書之中。

從對比研究中，我們發現《禮記》的編訂毫無疑問在《孔子家語》之後，這與前述《家語》的成書與流傳完全吻合。從這樣的結論看，王柏所謂「雜取」「《二戴》之緒餘」，「混亂精粗，割裂前後，織而成之」的說法實在無從談起。

20 朱熹，〈戰國漢唐諸子〉，黎靖德編，《朱子語類》，卷137。

21 楊朝明，〈《中庸》成書問題新探〉。

22 （宋）朱熹，《中庸章句集注》。

23 筆者曾為敝校專門史（思想史）專業研究生開列《中國思想史專題及史料選讀》研究參考題，將《禮記》、《大戴禮記》與《家語》的相應部分進行比較，由此觀察文字差異及其透露出來的文獻因革資訊，大家的結論基本一致。

王柏提出《家語》偽書說，迎合了當時疑經、疑古的思潮，其實也與他自己的學術個性有關。清人對他評價說：

柏好妄逞私臆，竄亂古經。《詩三百篇》，重為刪定書之；周誥殷盤，皆昌言排擊。無所忌憚，殊不可以為訓。……後雖折節學問，以鎔煉其氣質，而好高務異之意，仍時時不能自遏。故當其挺而橫決，至於敢攻孔子手定之經。其詩文雖刻意收斂，務使比附於理，而宋臣強就繩尺，時露有心牽綴之跡，終不似濂溪諸儒深醇和粹自然合道也。²⁴

王柏研究《家語》正是這種作風。他尊重朱熹，但懷疑其所說的「《家語》為先秦古書」是其「初年之論」，他認為朱熹那時還沒有機會深入思考，所以在《中庸集注》中才說了那樣的話。王柏認為《家語》的竄亂不止一次，實際上是一而再，再而三，他說：「《家語》之書，洙泗之嫡傳也，不幸經五變矣：一變于秦，再變於漢，三變于大戴，四變于小戴，五變于王肅。洙泗之流風餘韻，寂然不復存。」他不明白今本《家語》成書與流傳的真相，更沒認真對照研究，反認為「以今《家語》正《中庸》，終恐有所未安。」他還主觀地認為，憑朱熹晚年的論述，時間既久，其對《家語》的看法「未必不改」。

王柏對《家語》的所謂「考」其實沒有任何切實的證據，如其自述：「意王肅雜取《左傳》、《國語》、荀、孟、二戴之緒餘，混亂精粗，割裂前後，織而成之。」原來他的結論是他自己憑空想出來的。可是，就是他「意」出的這個結論，卻對後世產生了較大影響。例如，明代何孟春似乎就接受了王柏的「高見」，他說：「安國及向之舊，至肅凡幾變，而今重亂而失真矣。」²⁵何孟春尤為不信今本《家語》，與王柏的看法有相通之處。

第四，四庫館臣以為「偽而不能廢」。

王柏所謂的「割裂」說在清代影響很大。四庫館臣的說法可為代表。《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子部一·儒家類·家語提要》敘說了有關爭論：

宋王柏《家語考》曰：四十四篇之《家語》，乃王肅自取《左傳》、《國語》、《荀》、《孟》、《二戴記》割裂織成之。孔衍之〈序〉，亦王肅自為也。獨史繩祖《學齋占畢》曰：「《大戴》一書雖列之十四經，然其

24 《四庫全書總目·集部·別集類三·魯齋集提要》。

25 朱彝尊，《經義考》卷278所附《何氏孟春家語傳序》。

書大抵雜取《家語》之書，分析而為篇目，其〈公冠〉篇載成王冠祝辭內有『先帝』及『陛下』字，周初豈曾有此？《家語》止稱『王』字，當以《家語》為正」云云。今考「陛下離顯先帝之光曜」已下，篇內已明云「孝昭冠辭」，繩祖誤連為祝雍之言，殊未之考。蓋王肅襲取〈公冠〉篇為〈冠頌〉，已誤合「孝昭冠辭」于「成王冠辭」，故刪去「先帝」、「陛下」字。《家語》襲《大戴》，非《大戴》襲《家語》，就此一條，亦其明證。其割裂他書，亦往往類此。反復考證，其出於肅手無疑。特其流傳既久，且遺文軼事，往往多見於其中，故自唐以來知其偽而不能廢也。

四庫館臣所謂「割裂他書」，與王柏的說法如出一轍。在他們的論述中，其核心的論證只有一個，即《家語》襲取《大戴》，這就是他們舉出的所謂「明證」。但是，經過認真研究，這個證據卻難以成立。

四庫館臣批評史繩祖，其實是他們自己沒有細考。當然，史繩祖所言也有偏頗，《大戴禮記》雖然雜取《家語》之書，但〈公冠〉篇中的所謂「先帝」、「陛下」等等確非《家語》本有，而屬於《大戴》編者加入的「孝昭冠辭」。而《四庫提要》以《家語》襲《大戴》，謂王肅襲取〈公冠〉篇為〈冠頌〉，已誤合「孝昭冠辭」於「成王冠辭」，王肅刪去「先帝」、「陛下」等字。其實，《家語》根本沒有所謂「孝昭冠辭」，四庫館臣連最起碼的材料比對工作都沒有做，還竟然批評史繩祖的說法「殊未之考」！很顯然，他們是帶著《孔子家語》「出於肅手無疑」的先入之見進行評判和議論問題的。

漢代學者編輯《大戴禮記》時，將《家語》等書與其他材料彙集起來，然後進行了一些編輯加工，在《大戴禮記》中，反而看不出《家語》等書原貌。這與《禮記》取材於《家語》一樣，同樣也是「滅其原而存其末」的行為。加之《家語》偽書說的極大影響，便造成了《孔子家語》和《大戴禮記》材料孰為本末理解上的嚴重混亂。例如，有學者研究《大戴》而排斥《家語》，而《大戴》改編《家語》時「多有不善，屬辭不能明白」，致使在解說《大戴》時不得不穿鑿附會，曲為之說，清代學者王聘珍就是如此，例如，有的篇章中，《家語》的話意義明確，但《大戴禮記》卻頗令人費解。王聘珍只能曲為解釋，雖有可通，但與孔子本意已經大相徑庭。²⁶

26 楊朝明，〈讀《孔子家語》劄記〉，頁43-51。

四庫館臣所說《孔子家語》「不能廢」是沒有問題的。事實上，歷代不得不重視《家語》者大有人在，在某種意義上可以說是代不乏人，連四庫館臣在編輯《四庫全書簡明目錄》時，仍然將《孔子家語》置於「儒家類」的前面。他們解釋說：「《家語》，雖名見《漢志》，而書則久佚。今本蓋即王肅所依託以攻駁鄭學，馬昭諸儒已論之詳矣。然肅雖作偽，實亦割裂諸書所載孔子逸事，綴輯成篇，大義微言，亦往往而在，故編儒家之書者，終以爲首焉。」²⁷

不過，四庫館臣所謂「自唐以來知其偽」卻有些言過其實。三國時馬昭的話固然導致了人們對《家語》的懷疑，但他並沒有以《家語》爲偽。唐代編撰的《隋書·經籍志》還進一步表明了對《家語》的看法：「《論語》者，孔子弟子所錄。孔子既敘六經，講於洙泗之上，門徒三千，達者七十。其與夫子應答，及私相講肄，言合於道，或書之於細，或事之無厭。仲尼既沒，遂輯而論之，謂之《論語》……其《孔叢子》、《孔子家語》，並孔氏所傳仲尼之旨。」《家語》與《論語》性質相同，這與孔安國的看法完全一致。

唐中葉開始出現疑經現象，但主要是懷疑漢唐的經學注疏，以突破舊的注疏傳統。考察唐代學術，可發現當時研究《家語》的學者並沒有人認爲是王肅偽造。前面說到，顏師古所謂「非今所有《家語》」不等於說「今之《孔子家語》是偽書」，《孔子家語》被當時諸多學者所引用，張守節的《史記正義》，特別是司馬貞《史記索隱》大量引用《家語》。這都說明人們沒有把《家語》作偽書看待。

唐代官方的《五經正義》、《史記》唐人注解等廣泛引用《家語》，顯示了一些著名學者對《家語》重要文獻價值的認同。顏師古所說「非今所有《家語》」，並非對今本表示懷疑。可能是受馬昭「《孔子家語》王肅所增加」評論的影響，疑古先驅劉知幾曾說《孔子家語》「受嗤當代」。²⁸

宋代以後，疑古思潮湧動，自王柏之後，《孔子家語》爲「偽書」的說法逐漸擴大，到明清時期，《家語》的地位可謂一落千丈，其書不真的看法竟然盛行開來。

從唐至明，以《孔子家語》爲「偽」的人並不算多，但由於這種看法迎合了宋以後興起的疑古思潮，《孔子家語》「偽書」說的影響卻顯得很大。例如，明

27 《四庫全書簡明目錄·卷九·子部一·儒家類》。

28 《史通·內篇·六家》。

代何孟春曾補注《家語》，共八卷四十四篇，何孟春說孔安國本「世遠不復得」，他也沒有見過宋版的王肅注本，所補注的也非顏師古所說的唐本，而是宋人王廣謀的《新刊標題句解孔子家語》本。他雖然相信孔衍上書，但認為〈孔安國序〉出於王肅偽造，因此他乾脆在〈孔安國序〉前加上了「魏王肅序」的名字，並引馬昭的觀點來支持自己的判斷。清儒多襲何氏之說。

清代持《家語》「偽書」說的學者中，影響較大的是范家相、孫志祖等人。范家相撰《孔子家語證偽》，他將與《孔子家語》相通、相近、相同的材料逐一比類，放在一起，意在證明《家語》是偽書，並根據今本《家語》「每事必有所出」，而斷言其為割裂他書而成。孫志祖撰《家語疏證》，也認為王肅偽造《家語》，認為：「王肅作偽難鄭，誣聖背經，既作《聖證論》以攻康成，又偽撰《家語》，飾其說以欺世。因博集群書，凡肅所剽竊者，皆疏通證明之。」²⁹ 他的《家語疏證》影響很大，陳鱣、梁玉繩都推崇此書，認為孫志祖「討本尋原」、「劃訛辨謬」、「發昔人未發之覆」，陳鱣甚至稱其為捕盜者「獲真贓」。³⁰

雖然以《家語》為「偽」的學者大有人在，但認同其書的人依然不少。針對《家語》為「偽書」的觀點，也有學者力辯其真。在宋代，朱熹、晁公武、葉適等人就都認為《孔子家語》是靠得住的著作。葉適說得很精到：「《孔子家語》四十四篇，雖安國撰次，按後序，實孔氏諸弟子舊所集錄，與《論語》、《孝經》並時，取其正實而切事者別為《論語》，其餘則都集錄之，名曰《孔子家語》。」又說：「《孔子家語》漢初已流布人間，又經安國撰定。」³¹ 元朝，馬端臨《文獻通考》記載：「《孔子家語》十卷，王肅注。」³² 表明當時傳流著十卷本的《家語》。馬端臨在《通考》中還著錄了《家語》孔安國序、孔衍奏言、王肅序、晁氏說、《朱子語錄》、〈與呂伯恭書〉等幾條材料，而這些都屬於認同《孔子家語》一書價值的觀點，表明了馬端臨的傾向。陸治是明代繼何孟春之後《孔子家語》的又一重要補校者，他首先認為《家語》得以流傳，王肅功不可沒，並且考證了〈孔安國序〉確實出自孔安國，非王肅偽作。他還說：「肅之於猛，猛之于安國，安國之于恭王，其相次授受皆為事實。」³³

29 《清史稿·儒林列傳二》。

30 陳鱣，〈家語疏證序〉，收於孫志祖，《家語疏證》。

31 葉適，《習學記言序目》，頁231-232。

32 馬端臨，《文獻通考》，卷184，〈經籍考十一〉。

33 陸治補校，《孔子家語》。

儘管明清兩代疑古思潮的影響逐漸增強，但仍有不少學者看到《家語》的價值。在這些學者當中，作出重要貢獻者應屬清人陳士珂。他作《孔子家語疏證》，不作主觀判斷，而是廣泛搜求，給讀者客觀的材料。他所用的方法與范家相相同，但得出的結論卻與之迥異。其族人陳詩為該書作序，他推重《孔子家語》，也推重這樣的研究方法。他認為「事必兩證而後是非明」，他說：「予觀週末漢初諸子，其稱述孔子之言，類多彼此互見，損益成文，甚至有問答之詞，主名各別。如《南華》「重言」之比，而溢美溢惡，時時有之，然其書並行，至於今不廢，何獨於是編而疑之也。」³⁴從而認定今本《家語》乃是真本。

很有意思的是，孫志祖的《家語疏證》雖然有人極力稱讚，但也有人持不同態度，例如同為其書作序的錢馥就是如此，他並不認同孫志祖等人的研究結論。錢馥認為王肅是在原有的二十七卷的基礎上增加了十七篇，其看法顯然是受到馬昭所謂「王肅所增加」之說的影響，此說自然存在問題，但他畢竟不能同意王肅偽造整部《家語》的說法。

看來，四庫館臣所說的「不能廢」是歷史的真實，但其真正原因卻應該是其書不偽。一般說來，其書既不能廢，原因不外有二：一是其書為真，二是書雖不真而材料不偽。按照歷來「偽書」說者對《家語》的看法，他們無非是受到了《家語》「割裂」眾書之說的影響，而前已經指出，這種所謂「割裂」說經不起推敲，由此，「書雖不真而材料不偽」之類的觀點就難以成立，所以《家語》不偽是完全可以肯定的。

（四）疑古思潮與《孔子家語》

在對《孔子家語》的理解、認識與研究中，它始終與中國學術的一個重要思潮相聯繫，這就是「疑古」。

疑古思潮可謂源遠流長，有人追溯疑古學者，認為可以上推到東漢王充。唐代劉知幾則明確提出了疑古的概念。在《史通》之中，劉知幾撰有〈疑古〉、〈惑經〉等篇，對一些儒家經傳提出疑問。他也曾經談到《孔子家語》：「孔門之著錄也，《論語》專述言辭，《家語》兼陳事業。」³⁵還說：「《世本》辨姓，

34 陳詩，〈孔子家語疏證序〉，收於陳士珂，《孔子家語疏證》。

35 《史通·外篇·疑古》。

著自周室；《家語》載言，傳諸孔氏。」³⁶ 雖也有《家語》「畫虎不成，反類犬也」、「其書受嗤當代」³⁷ 這樣的話，但他卻沒有懷疑《家語》為偽。

宋代，疑古思潮勃興，出現了皮錫瑞《經學歷史》中所謂的「經學變古時代」。他們不僅懷疑與批評漢唐傳注，而且懷疑並考辨傳世經典。事實上，宋代疑古涉及到學術的很多方面，而以經學懷疑最為突出，甚至興起了疑經改經之風。

有學者對宋代的疑古思潮進行研究，指出整個宋代疑古思潮有一個從濫觴、全面展開到深化的過程，到了晚宋，疑古成為經學思潮的重要內容，這時期，一部分走向考據之學，主張實事求是；另一部分學者可以稱為唯理派，以理衡經，以理疑經，以己意為理，疑古勢必走向肆無忌憚，這以王柏等學者為代表。³⁸ 王柏是提出《家語》「偽書」說的第一人，他曾經對《尚書》、《詩經》篇目也作過較大的改動或刪削，受到後人批評。王柏關於《家語》為王肅「割裂」織成的說法，無疑與宋代疑古思潮的推動有重要關聯。宋代疑古思潮的影響是極其深遠的，明清時期，一些學者承其餘緒，將疑古不斷推向高潮。

近代以來的疑古思潮，顧頤剛毫無疑問是典型代表。顧氏的一個重要「理論」就是「層累地造成的古史說」。有學者指出，「層累造成說」有一個相當突出的特質，那就是他把「層累」看成是有意造偽的結果，而不是自然累積而成的。這是康有為《新學偽經考》和《孔子改制考》所造成的影響。而康有為的這兩部書也不是平地特起的，乃清代今文學長期發展的結果。所以，有學者認識到：廖平、康有為、崔適的疑古活動都出現在近代反傳統運動尚未爆發前，而且是由強烈的尊孔衛道意圖逼出了那樣大規模的疑古思想，但到後來，他們的疑古成果卻被反傳統的疑古健將所繼承，爆發了古史辨運動。³⁹

就《孔子家語》而言，顧氏的觀點也很有代表性。1928年到1929年，他在中山大學期間曾撰有《孔子研究講義》，講義的《按語》集中體現了他對《孔子家語》的看法。對於清朝學者的《家語》研究，顧氏的傾向性十分明顯，他在所編〈按語〉中列「參考書」，關於《孔子家語》，他除了列有《家語》本子，並且注明「此書為王肅偽作，但係輯集古書而成」外，還列有孫志祖《家語疏

36 《史通·內篇·雜述》。

37 《史通·內篇·六家》。

38 楊世文，〈宋代疑古思潮研究〉。

39 王汎森，《古史辨運動的興起》，頁294。

證》、范家相的《家語證偽》，且說明「以上二書辨《家語》之偽」，可是，標榜「研究」、做「超然者」的顧頡剛，在整個的《講義》之中，卻隻字不提陳士珂及其《孔子家語疏證》，好像陳士珂和他的著作根本不存在一樣。顧氏的〈孔子研究講義按語〉⁴⁰給人的印象是，這時期的疑古辨偽幾乎達到了「失控狀態」。

顧頡剛對《家語》的印象正如他自己所說的，此書雖為記載孔子之專書，卻無任何取信之價值。既然該書是極其典型的偽書，在學術上「未曾發生影響」，那麼此書連「痛加攻擊之必要」也沒有。今本《家語》既偽，那麼《家語》「三序」自然靠不住，顧頡剛認為：「王肅偽作《家語》，賴以欺人者在其所偽造之孔安國序及孔衍表。」因此，前人有疑其有問題者，自然就屬於「精心」的辨析，完全可以成為考訂古籍的樣板了。在顧氏那裏，《家語》就是「偽書之中尤其偽者」，於是他對《家語》便不再細究，認為「《家語》出於西漢人偽造，至王肅又別偽一本」。可是，今本到底如何，好像他本人也拿不准，所以一會說，「今之所傳之《家語》實王肅學說支配下之孔子記載」、「為王肅偽作」，一會又說，「今日之本則又非王肅之舊，可謂贗中有贗」。

顧頡剛希望用「客觀的態度來研究孔子」，「不存計算功利的念頭」，從而去尋得「真」的孔子，剝去後來各個時代為孔子披上的「外衣」。他認為自己是以一位「超然者」的身份出現的。但實際上，人文學科的研究哪裡會有純粹意義上的「超然者」？在顧氏心目中，孔子的本真僅是「君子」而已，他希望自己的研究能夠恢復孔子的本真，使「各時代人替孔子加上的偉大都還給各時代」，只是顧氏有不少都「還」錯了對象。

自今日視之，顧頡剛所辨不當已不難判定。從整個《按語》看，顧氏喜歡酣暢淋漓的懷疑和「辨偽」，只是嫌人「辨偽」不足，「缺乏批評精神」。顧氏已經在自己的思路中煞不住車，一旦發現「偽跡」，就不再反轉過來考慮。例如，范家相判定《家語》三序為偽，顧氏還認為其考訂未盡，因為《史記》謂孔安國早卒，而《家語》後序乃言「年六十卒於家」，「豈年六十猶可云『早卒』乎！」顧氏為了說《家語》為偽，不得不承認他「彌縫甚工」；而在這裏，他指出的卻是一個極低級的「錯誤」。他不再去想：難道王肅如此之愚，他能細密地偽作整部《家語》，為什麼還會在這裏露出馬腳？

40 顧頡剛，〈孔子研究講義按語〉。

三、出土文獻與《孔子家語》價值再認識

縱觀《孔子家語》兩千多年流傳、研究史，我們竟難以找到真正能夠證明該書之偽的任何可靠證據。但是，由於缺乏新材料，一些相關典籍又隨著疑古思潮的逐步高漲陸續被打入了偽書的行列，沒有了證據，就失去了繼續探討的前提，《家語》偽書說幾乎成為鐵案，討論其書之真就越來越缺少空間。值得欣慰的是，上個世紀七十年代以來，早期思想文獻陸續出土問世，學者們得以重新研究該書。

（一）出土文獻與《孔子家語》研究

在許多人指摘《孔子家語》之「偽」的同時，也有人清醒地意識到該書的價值，或部分地理解到該書成書的真相。對於疑古之過，很多學者也已經加以指出。

令人欣慰的是，二十多年來，學術界不僅「進一步的研究」已經展開，更有大批「有價值的考古材料出現」，這些材料，就是近三十年來陸續問世的簡牘帛書，對這些新材料的整理與研究，為中國古代文化典籍的認識和研究帶來了極大改觀，「就古籍辨偽而言，竹簡帛書出土所帶來的震撼，恐怕與古史辨派新說的震撼不相伯仲；因為古史辨學派為古籍真偽帶來『石破天驚』的新說，而竹簡帛書卻為這些新說帶來『冷酷無情』的否決……。在竹簡帛書嚴峻的考驗下，許多被過去學者判定為偽造的古籍，都紛紛平反翻身。」⁴¹

《孔子家語》衝破疑古「堅冰的封凍」也是借助了新的簡牘材料。這些材料啟發人們重新認識《家語》的材料來源、編撰、《家語》與孔安國的關係、「王肅偽造《家語》」說等重大學術問題。直接給《家語》研究帶來新契機、新局面的材料，主要有河北定州八角廊漢墓竹簡、安徽阜陽雙古堆漢墓木牘、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等。

第一，河北定州八角廊漢墓竹簡。

1973年，河北定縣八角廊漢墓出土了一批竹簡，整理定名為《儒家者言》。這部書的絕大多數內容散見於先秦和西漢時期的一些著作中，特別是與《孔子家

41 鄭良樹，〈論古籍辨偽的名稱及其意義〉，收於鄭良樹，《諸子著作年代考》。

語》有密切的關聯。⁴² 較早看到《儒家者言》材料的學者認為它「是一部和《論語》很有關係的儒家的著作」，與《孔子家語》關係密切，《家語》的真偽應再討論。⁴³

李學勤對這批材料進行了研究，他認為《儒家者言》「可稱為竹簡本《家語》」，開啓了重新認識《孔子家語》的先聲。李氏從竹簡和《論語》的關係來論證出土簡牘與《家語》的關係，認為《儒家者言》與《論語》同出一墓，印證了《漢志》把《家語》放在「論語類」的記載，說明二者關係之密切。這也同時印證了《家語》孔安國序的一些說法。

孔安國整理《孔子家語》，基本上把自己認為屬於《家語》的材料全部獲取，包括顏師古所言「非今所有」、後人「未見」的個別材料，或者就是孔安國以為本不屬於《家語》因而「不取」、「不錄」的一小部分，其他材料基本已被今本《家語》囊括其中。學者們認定定州竹簡《儒家者言》與《孔子家語》有一定的聯繫，這是應當沒有問題的，但以為《孔子家語》的材料就來源於這批竹簡，恐怕未必合適。

《儒家者言》在性質上與《家語》相同，但其中有不少今本《家語》不見的材料，這也是後人懷疑《家語》的重要原因。我們認為，《儒家者言》的一些材料不見於《家語》十分正常，這並不能證明《家語》為後世編輯而成。當年，孔安國編輯《家語》時，他並沒有像二戴編輯《禮記》那樣，時時處處有所顧忌，一定不能有忤漢代時政。⁴⁴ 孔安國的強烈動機或目的顯然是為了避免其「先人之典辭將遂泯沒」，似乎並沒有材料證明像他的孫子那樣希望「記錄別見」、「以聞奏上」。他非常希望這些材料能夠完整地保存下來。於是，他將秘府所藏「募求其副」，並且認為自己「悉得之」。

但是，《漢志》著錄的《家語》有二十七卷，在內容上應當超出孔安國整理的本子很多，因此，劉向看到的有關材料可能會多出孔安國的《孔子家語》，也正因為如此，定州竹簡《儒家者言》有的材料可以見於《說苑》而今本《家語》

42 有關情況可以參看河北省文物研究所，〈河北定縣40號漢墓發掘簡報〉，頁1-10；國家文物局古文獻研究室、河北省博物館、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定縣漢墓竹簡整理組，〈定縣40號漢墓出土竹簡簡介〉，頁11-13。

43 何直剛，〈《儒家者言》略說〉，頁20-22。

44 楊朝明，〈讀《孔子家語》劄記〉。

未必有，如果是這樣，孔安國是否真的全部得到了有關材料還存在疑問。即使孔安國已經全部得到了相關材料，也有不少沒有被編輯到《孔子家語》中。關於這一點，孔安國本人已經交代得很清楚，他在《孔子家語》序文中說：除了曾子〈問禮〉一篇，「其諸弟子書所稱引孔子之言者」，他認為「本不存乎《家語》」，故「皆不取」。孔安國還強調說：「將來君子不可不鑒！」可是，遺憾的是，孔安國所說的這些「諸弟子書」，目前也都已經無從見到。

第二，安徽阜陽雙古堆漢墓木牘。

1977年，安徽阜陽雙古堆一號漢墓出土了三塊木牘，其中以一號木牘保存最完好，正反兩面寫字，每面皆分為上、中、下三欄，現存章題四十七個，其中一個字跡模糊無法釋讀。⁴⁵ 這些章題絕大部分可以在傳世的文獻中找到相應的內容。特別是一號木牘的四十六個章題中，絕大多數和孔子及其門人有關，這很容易讓人們聯想到，如此集中地將孔子和他的學生的言論事蹟彙集在一起，很像《孔子家語》的體例。

由於與定州漢墓竹簡的材料相通，鑒於定州這批竹簡已經被定名為《儒家者言》，而阜陽木牘沒有標出自己的名字，有學者遂直接稱之為《儒家者言》。⁴⁶ 這當然同樣也有問題。

從阜陽木牘的文字中，人們首先思考了其與《家語》的關係。整理者認為：「舊說以為《孔子家語》，王肅偽作，今阜陽漢簡木牘證明早在西漢初期，已有類似的書籍。」⁴⁷ 有學者把阜陽木牘章題與《家語》、《說苑》、《荀子》、《孟子》、《晏子春秋》、《韓詩外傳》進行比較、校勘，通過論證分析一號木牘第二十九號章題「曾子問曰□子送之」，認為《家語》所記內容淵源有自，並與阜陽雙古堆一號木牘關係密切；通過考證第四十二號章題「仲尼曰史鯀有君子之道三」，認為「一號木牘應是一本單獨的書，從內容上看，應是思孟學派記錄孔子及其門人言行的著作，其時間應當在《荀子》之前。」⁴⁸

阜陽雙古堆一號木牘內容重要，其書出現時間很早。簡牘內容廣泛見於《家

45 有關情況可參考國家文物局古文獻研究室、安徽省阜陽地區博物館阜陽漢簡整理組，〈阜陽漢簡簡介〉，頁21-23；胡平生，〈阜陽雙古堆漢簡與《孔子家語》〉。

46 韓自強，〈阜陽漢簡《周易》研究〉，頁155。

47 國家文物局古文獻研究室、安徽省阜陽地區博物館阜陽漢簡整理組，〈阜陽漢簡簡介〉。

48 朱淵清，〈阜陽雙古堆1號木牘劉記二則〉，頁17-21。

語》，無疑是研究《家語》成書問題最為直接的寶貴材料。在竹簡的介紹中，整理者明確地說：「（一號木牘）正、背兩面各分三行書寫，今存篇題四十六條，內容多與孔子及其門人有關，如『子曰北方有獸』，『孔子臨河而歎』，『衛人醢子路』等等。這些篇題的內容大多能在今本《孔子家語》中見到。」因此，他們推想：「這些簡牘應當就是孔序所說的『百餘篇』中的一部分，它們在文帝中已『散在人間』——在諸侯王府內輾轉傳抄，後來到景帝末被送進了秘府。劉向編《說苑》、《新序》，用的是這一批材料；孔安國編《家語》用的也是這一批材料。」⁴⁹顯然，這樣的推想很有道理！

據介紹，阜陽雙古堆一號漢墓的墓主是西漢第二代汝陰侯夏侯灶。夏侯灶是西漢開國功臣夏侯嬰之子，卒於文帝十五年（前165年）。因此，「阜陽漢簡的下限不得晚於這一年，大抵為漢初遺物。」⁵⁰而據孔安國的《家語》序文，《家語》在流傳過程中有散落到民間的一個過程，這才使得「京師士大夫」擁有了《孔子家語》的材料，阜陽雙古堆一號漢墓出土的木牘，應該屬於這時期《家語》「散在人間」後傳抄而成。

第三，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

如果說定州漢墓竹簡幫助人們開啓了新時期《家語》研究的大門，阜陽漢墓木牘使人們看到了《家語》的章題，那麼，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的問世，則使戰國時期《家語》的「真容」實實在在地呈現在了世人面前。

在上博竹書中，有一篇被定名為〈民之父母〉⁵¹的文獻，該篇與《孔子家語》的〈論禮〉相同。又因為該篇同時見於《禮記》的〈孔子閒居〉，所以，在上博竹書〈民之父母〉公佈以前，我們曾經據此討論過竹書、《禮記·孔子閒居》與《孔子家語》的先後關係。那時，我們指出：「《禮記》編成在西漢時期，上博楚簡的該篇早於《禮記》自無問題。將現今知道的兩支竹簡與《禮記》的〈孔子閒居〉在使用虛詞方面進行對照，似乎也透露了楚簡較早的資訊。如楚簡『何如斯可謂民之父母』，〈孔子閒居〉尾碼有『矣』字；楚簡的『民之父母乎必達於禮樂之原』，〈孔子閒居〉前面有發語詞『夫』字。語氣詞的使用，西漢時期應當高於戰國之時。用語言比較法為古文獻斷代，這是不少學者用過的方法。上博楚簡該

49 國家文物局古文獻研究室、安徽省阜陽地區博物館阜陽漢簡整理組，〈阜陽漢簡簡介〉。

50 國家文物局古文獻研究室、安徽省阜陽地區博物館阜陽漢簡整理組，〈阜陽漢簡簡介〉。

51 馬承源主編，《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二）》。

篇公佈後進行通篇統計比較，恐怕更能說明問題。」⁵²

現在，我們已經能夠完整地看到上博竹書中的該篇。通過三篇語句異同的比較，發現〈民之父母〉與《禮記·孔子閒居》的區別在於後者使用語氣詞較多，有顯著的修飾成分。上博竹書出於南方戰國時期的楚墓，這屬於那時傳入楚地的《家語》傳本，從整體上看上博竹書，這批應該出於同一墓葬的材料，應是當時流傳到楚國的思想文獻的選編，因而與《禮記》選編儒家文獻具有同樣的性質，所以，上博竹書〈民之父母〉也有文字的修飾成分。如果認真比較，不難看出，作為文獻選編本，無論《禮記》還是上博竹書，他們在傳抄中都會有語句的修飾與改動。

再如，將記述同一內容的《孔子家語·論禮》、《禮記·孔子閒居》、上博竹書〈民之父母〉之相關文句進行比較，我們發現在大多情況下，《家語》往往顯得更為完整、古樸，一般還有事情的原委交代。從整體看，還是應該承認經過孔安國整理的今本《家語》更為近真。

〈民之父母〉、〈論禮〉、〈孔子閒居〉三者同為一篇，卻又不是同一傳本的事實，說明《孔子家語》絕非後人〈割裂〉而成。最令人震撼的，自然是上博竹書〈民之父母〉的問世。戰國中期，該篇已經傳至南方楚地，並且它與那麼一大批思想文獻同出一墓，這在疑古思潮盛行的年代裏，這樣令人難以置信的事實，一定會令許多人目瞪口呆。但它畢竟是活生生的現實，上博竹書〈民之父母〉一篇的發現，真簡實貨擺在了大家的面前，人們不能不相信戰國時期《孔子家語》的單篇已經流傳很廣。

龐樸曾經研究了上博竹書〈民之父母〉中的「五至三無」之說，並且深入思考了包括《孔子家語》成書問題在內的許多學術問題。他說：「以前我們多相信，《家語》乃王肅偽作，雜抄自《禮記》等書；《禮記》乃漢儒纂輯，非先秦舊籍，去聖久遠，不足憑信。具體到「民之父母」一節，則認為，其「五至三無」之說，特別是「三無」之「無」，明顯屬於道家思想，絕非儒家者言，可以一望而知。現在上博藏簡〈民之父母〉篇的再世，轟然打破了我們這個成見。對照竹簡，冷靜地重讀《孔子家語·禮論》和《禮記·孔子閒居》，不能不承認，它們確係孟子以前遺物，絕非後人偽造所成。」⁵³

52 楊朝明，〈《禮記·孔子閒居》與《孔子家語》〉，收於氏著《儒家文獻與早期儒學研究》。

53 龐樸，〈話說「五至三無」〉。

上博竹書〈民之父母〉的問世，其價值自然是多方面的。《孔子家語》與其他文獻的相通，如果深入探討，早期儒學研究一定會真正出現一個全新的局面。比如，龐樸還有幾句話能夠深深打動人心，這就是當他「吃驚」地看到極似道家的語言竟然出於「孔子」之口時，他說：「過去我們可以推說這是偽作，現在顯然沒有這等方便可撈了，因為竹簡俱在。面對竹的事實，我們不能不改弦更張，溫故知新，清理成見，重新認識。」這種「竹」的事實，與「鐵」的事實無異。我們認為，龐樸所說成見的「轟然打破」，可以作為「《孔子家語》偽書案」最後終結的標誌，因為學者以前主要在文獻比較的層面上進行了研究，龐樸則主要是從思想比較的層面上認定《家語》「確係孟子以前遺物」。兩方面有共同的認識，證據應當成立。

（二）《孔子家語》存在的問題

《孔子家語》不是偽書，自然不是說該書沒有任何問題，只是這些問題與該書不可靠是完全不同的兩回事。它的成書與流傳過程，已經告訴了我們一些資訊，使我們應當明確以下幾個方面的問題：

第一，該書可能有孔子弟子整理時的「潤色」。

從理論上講，流傳下來的中國古代文化典籍絕大多數都會有後人「潤色」的因素包含其中，「六經」如此，孔子遺說更是如此。從解釋學的角度看，任何著作的編輯都有編輯者的思想包含其中，因此，即使像具有「正實而切事」特點的《論語》也一定蘊含有孔子後學編撰者的理念。在這樣的意義上，我們當然可以利用漢代成書的著作研究「漢代的孔子」，但是，這並不一定意味著漢代整理或者編輯而成的著作就不能研究「春秋時期的孔子」。

《孔子家語》中的材料最初出於孔子弟子，在某種程度上，也一定表現了「孔子弟子心目中的孔子」。孔安國曾說：今本《家語》屬於七十二子「各自記其所問」而來，顯然，《家語》經過了他們「各共敘首尾，加之潤色」的過程，這當然沒有問題。問題在於，他們的「潤色」是否改變了孔子表述的原意。不難理解，在主觀上，孔子弟子都會盡可能地保存孔子思想本真。因此他們才會在孔子論說之後馬上「退而記之」。如此說來，孔子弟子對《家語》材料「各共敘首尾」，進行「潤色」，無非是為了使自己的記述更為準確，不至偏離。

當然，孔子弟子各有差異，他們在思想上甚至也會有一定的距離，因此，《家

語》各篇才會「其材或有優劣」。各篇的不同，表現在有的篇章有「屬文下辭，往往頗有浮說，煩而不要」的現象。毫無疑問，這是《孔子家語》存在的一個問題。不過，畢竟不是各篇都充斥著「煩而不要」的「浮說」。從作為思想史研究史料的角度看，《孔子家語》這種古樸的面貌，恰恰襯托了它的重要價值。

對孔子遺說材料的懷疑很早就出現了。還在孔子裔孫子思的時候，人們就對子思所記述的孔子遺說的可靠性表示了質疑。魯穆公對子思說：「子之書所記夫子之言，或以謂子之辭。」對此，子思回答說：「臣所記臣祖之言，或親聞之者，有聞之於人者，雖非正其辭，然猶不失其意焉。且君之所疑者何？」按照子思的說法，他記錄孔子言語目的在於表述孔子的原意，即使不是他的原原本本的表述，但「不失其意」，不應當懷疑。所以子思對魯穆公說：「無非，所以得臣祖之意也。就如君言，以為臣之辭。臣之辭無非，則亦所宜貴矣。事既不然，又何疑焉？」⁵⁴

與子思不同，孔子弟子所記應當主要出於「親聞」，這比子思著作中還有「聞之於人者」顯得更為「純粹」，《孔子家語》同樣也「實自夫子本旨」。我們認為，「實自夫子本旨」正符合大量孔子遺說的實際情況，也的確是《孔子家語》材料的實情。

第二，該書可能有後人傳抄過程中的「增損」。

在研究《家語》的學者之中，雖然已經很少有人再相信所謂的《家語》偽書說，但以該書經過了後人的「改動」或「添加」者還有不少。那麼，作出這些「小動作」的是誰？有的認為是孔安國，有的認為是王肅，可是，到目前為止，還沒有真正具有說服力的證據能夠證明是他們進行了有意的改動。

但是，這並不是說《家語》經孔子弟子整理後再也沒有經過任何的改動，在傳抄過程中，對《家語》文字進行「增損」的情況是存在的，關於這一點，孔安國的〈後序〉已說明。按照他的說法，在其之前，《家語》經過了多次輾轉流傳，其間定有篇卷的分合，個別文字的變動也在所難免，在這個過程中，至少有一點值得注意：

其一，「孔子既沒而微言絕，七十二弟子終而大義乖，六國之世，儒道分散，遊說之士各以巧意而為枝詞，唯孟軻、荀卿守其所習。」

54 （漢）孔鮒，《孔叢子·公儀》。

其二，呂氏被誅亡以後，《家語》散入民間，「好事者或各以其意增損其言，故使同是一事，而輒異辭。」

戰國時期儒學流行很廣，他們在傳抄時難免有個別字詞的更動。比如，上博竹書〈民之父母〉，就屬於傳習者傳到楚地的《家語》材料。西漢秘府中收藏者也可能有除了荀卿所傳《家語》以外的相關材料，比如，孔安國所說與《家語》「錯雜」在一起的那些所謂「諸國事及七十子辭」等。後來，《家語》曾經分散到了民間，這時期可能傳抄更廣，隨意性更大。我們比較今本《家語·論禮》、上博竹書〈民之父母〉、《禮記·孔子閒居》，就能發現「以巧意而為枝詞」的現象。事實上，《孔子家語》與《禮記》、《大戴禮記》等多有相應篇章，將二者相應者進行對讀，就更能夠理解這種現象比較普遍，以至於還有個別「同是一事，而輒異辭」的情況。

另外，今本《家語》材料，在漢高祖滅秦剛剛得到時，本來「皆載於二尺竹簡，多有古文字」，人們的傳抄有一個改「古文」為「今文」的過程，這都會增加《家語》被人們「增損」的可能性。

需要指出的是，戰國時期《家語》雖然有的本子有些「枝詞」，但今之傳本傳自荀卿，荀子的本子因其「守其所習」會「枝詞」較少。後來流失到民間又復聚之於朝廷的材料中，雖然被「增損」的現象比較普遍，但孔安國畢竟發現了問題，可以想見，對其中的材料他也應當有所比較選擇，只是，要完全剔除這些「好事者」的「增損」並不可能。

實際上，古書的流傳過程一般都不是凝固不變的。李學勤曾經談到，一些古書，特別是那些世人愛讀的古書，常常會出現學者加以增補，內容加多的現象；還有，古人傳流書籍係為實用，並不專為保存古本。有時見古書文字艱深費解，就用易懂的同義字取代難字。⁵⁵ 這樣，古書本子的一定變化非常正常，人們「增損」《家語》之類的做法，在古書中是常有的情形。

第三，該書可能有孔安國整理材料時的誤排。

孔安國得到的這批材料，並不是集中而單純的《家語》，它們雖然原本都屬於《家語》，但該書字數眾多，而且已經散亂，不少肯定都是單獨的篇章。面對這批材料，孔安國首先是進行揀選，然後進行「撰集」，從而「以事類相次」。

「集錄」這些材料容易，排比次序卻非易事。首先，這些材料很多內容相

近，比如，其中有許多篇屬於魯國國君與孔子的問答，又有許多篇都是孔子弟子與孔子的對話，那麼，這些材料的先後如何排列？其次，不少材料都已經散亂，即使同為一篇的材料，孔安國看到的也不一定完整。所以，在《孔子家語》中，明顯可以看出有的篇章應該本非一篇。

（三）《孔子家語》的重要價值

縱觀《孔子家語》的研究，我們看出該書在歷代流傳、研究的狀況與當時的學術主流密切相聯，《孔子家語》的傳流、研究史，就是一部中國學術史的縮影。特別是《家語》在宋代疑古思潮興起以後至今命運的起伏跌宕，密切契合了各代的學術潮流。

就像任何事物的發展變化都具有一定的規律那樣，歷代對《家語》的認識也具有內在的邏輯線索。在經歷了對《家語》的懷疑乃至否定之後，經過了慎重研究，特別是由於新材料的輔助證明，《家語》成書的真相與學術價值終於被揭示出來，孔子儒學研究終於獲得了長期失落的寶貴材料。

《家語》偽書案的終結，為歷史文獻的研究方法提供了重要借鑒，也是歷代學者研究得失的一次很好檢驗。朱子說《家語》「是當時書」，所言極是！只要認真比較今本《家語》與材料相同、相通的有關典籍，就不難發現其極其寶貴的價值。例如，將《家語》與大、小戴《禮記》等進行比勘，《家語》就立即顯現出自己的優越性來。凡是對《家語》認真研究過的學者一般都認可其重要的文獻價值。有學者說：「《孔子家語》保存了一大批比較原始的文獻資料，有許多地方明顯地勝於其他相關古籍，具有重要的版本、校勘價值。」⁵⁶「對於今天的孔子研究來說，《孔子家語》的價值並不在《論語》之下。」⁵⁷《家語》由於內容龐大，該書價值之高出乎我們的想像，如果說《論語》是「孔子語錄」，《孔子家語》則相當於「孔子選集」。

對於《家語》與《論語》的關係，學者們的研究已經印證了孔安國〈後序〉的說法。孔安國說，《論語》具有「正實而切事」的特點，它是從眾多材料中選輯出來的孔子語錄，《孔子家語》成書在《論語》之後，具有材料彙編的性質，《家

55 李學勤，〈對古書的反思〉，《當代學者自選文庫·李學勤卷》，頁15-21。

56 王承略，〈論《孔子家語》的真偽及其文獻價值〉，頁14-18。

57 楊朝明，〈《孔子家語·執轡》篇與孔子的治國思想〉，《儒家文獻與早期儒學研究》，頁274。

語》中甚至有引述《論語》的現象。因此，比之《論語》的「純正」，《家語》要顯得「駁雜」。胡平生說得好：「絕大多數攻擊王肅偽撰《家語》的書，都是這樣先自己劃定某種聖人言行的『神聖模式』，凡有不合『模式』的文字則必打成偽作。」⁵⁸如果說真有一個「神聖模式」的話，那麼它一定與《論語》的「純正」有關。不少學者研究問題，往往不顧《論語》有特定的選材標準，而以「《論語》未見」為理由，否定一些孔子言行的存在，其偏頗顯而易見。

還有一種看法，認為「論語」的「論」，有「選擇」、「別擇」的意思。清朱駿聲《說文通訓定聲·屯部》曰：「論，段借為掄。」《國語·齊語》「權節其用，論比其材」韋昭注：「論，擇也。」《荀子·王霸》「君者，論一相，陳一法，明一指，以兼覆之，兼照之，以觀其成者也。」楊倞注：「論，選擇也。」如果《論語》書名的「論」為選擇之意，則《論語》應該是選自「孔子家」之「語」中的材料，是則《孔子家語》的價值不難察見。

受疑古思潮影響，歷史上有不少人認為《家語》思想不純、文詞粗陋，其實這不是帶著「有色眼鏡看問題」的偏見，就是沒有認真觀察比較的妄言。關於《家語》的文辭，清人崔述《洙泗考信錄》有曰：「取所采之書，與《家語》比而觀之，則其（按：指《家語》）所增損改易者，文必冗弱，辭必淺陋，遠不如其本書，甚或失其本來之旨。」⁵⁹其實，如果認真對比，就不難發現崔述所論以王肅「雜取衆書」偽造《家語》為前提，其論斷有極為強烈的主觀推定色彩，是完全不符合實際的。我們通過對讀《家語》與互見者所能得出的結論常是互有優劣，實際上更多情況是《家語》要優於他書。⁶⁰

在疑古思潮的影響下，有些學者雖沒有專門研究《家語》，沒有看到《家語》不偽的事實，卻發現了《家語》的重要價值，因而在相關的研究中不能對其視而不見，不得不引用該書的材料作為旁證，這便如清朝四庫館臣所謂「知其偽而不能廢」。例如，李啟謙在談論孔門弟子研究的材料運用問題時曾說：「有時可信的書中也有錯誤的地方，……相反，被稱為『偽書』的《孔子家語》，其所記的很多內容……則都是可信的。」⁶¹新的材料終於促使人們思考了最為根本的問

58 胡平生，〈阜陽雙古堆漢簡與《孔子家語》〉，頁531。

59（清）崔述，《洙泗考信錄》，卷1，頁3。

60 詳請看楊朝明，〈讀《孔子家語》劉記〉、〈《孔子家語·執轡》篇與孔子的治國思想〉（見《儒家文獻與早期儒學研究》頁274）。

61 李啟謙，《孔門弟子研究·前言》。

題：難道人們棄之如敝履般地摒棄《家語》是合理的？難道在那麼早的年代，這樣長長數萬字大書真的出於後人的偽託？為什麼歷史上還有那麼多的人不斷地強調該書的價值？

當我們回頭再看《孔子家語》時，我們不能不驚歎其豐富的內容！儒家典籍有「四書五經」的提法，如果加上《家語》，儒家最為緊要的典籍可有「五書五經」。《家語》不僅是專門的孔子儒學的記錄，而且在規模上也超過了儒家「四書」中的任何一部。與《論語》的簡略相比，《家語》有完整的場面；與《大學》、《中庸》作為專題論文相比，《家語》中的思想更為全面；《史記》記錄了孔子事蹟，但《家語》的記錄時代更早，內容更多，更加準確。孔子的思想博大精深，要準確地理解孔子，要真正走近孔子，絕不能捨棄《家語》，《家語》可以當之無愧地被稱為「孔子研究第一書」！

引用書目

一、傳統文獻

- (漢) 孔鮒，《孔叢子》，北京：中華書局，1985。
- (魏) 王肅注，《影宋蜀本孔子家語》，臺北：臺灣中華書局，1985。
- (唐) 孔穎達，《禮記正義》，李學勤主編，《十三經注疏》(標點本)，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
- (唐) 劉知幾，《史通》，四部叢刊本，上海：商務印書館，1929。
- (宋) 王柏，《魯齋集》，叢書集成本，北京：中華書局，1985。
- (宋) 朱熹，《四書章句集注》，北京：中華書局，1983。
- (宋) 葉適，《習學記言序目》，北京：中華書局，1977。
- (宋) 黎靖德編，《朱子語類》，北京：中華書局，1986。
- (元) 馬端臨，《文獻通考》，北京：中華書局，1986。
- (明) 陸治補校，《孔子家語》，明隆慶六年刻本。
- (清) 永瑤等撰，《四庫全書總目》，北京：中華書局，1965。
- (清) 永瑤等撰，《四庫全書簡明日錄》，北京：商務印書館，2005。
- (清) 朱彝尊，《經義考》，北京：商務印書館，2005。
- (清) 范家相，《家語證訛》，會稽徐氏述史樓叢書。
- (清) 馬國翰，《玉函山房輯佚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
- (清) 孫志祖，《家語疏證》，叢書集成初編本，北京：中華書局，1991。
- (清) 陳士珂，《孔子家語疏證》，叢書集成初編本，北京：中華書局，1985。
- (清) 崔述，《洙泗考信錄》，叢書集成初編本，北京：中華書局，1991。
- 趙爾巽等，《清史稿》，北京：中華書局，1977。

二、近代論著

- 王汎森，《古史辨運動的興起》，臺北：允晨文化公司，1987。
- 王志平，《中國學術史·魏晉南北朝卷》，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2001。
- 王叔岷，《史記斟證》，北京：中華書局，2007。
- 王承略，〈論《孔子家語》的真偽及其文獻價值〉，《煙臺師範學院學報》，2001年第3期，頁14-18。
- 王政之，《王肅《孔子家語》注研究》，曲阜：曲阜師範大學孔子文化學院碩士論文，

2006。

朱淵清，〈阜陽雙古堆1號木牘割記二則〉，《齊魯學刊》，2002年第4期，頁17-21。

李啓謙，《孔門弟子研究》，濟南：齊魯書社，1987。

李學勤，《當代學者自選文庫·李學勤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9。

何直剛，〈《儒家者言》略說〉，《文物》，1981年第8期，頁20-22。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河北定縣40號漢墓發掘簡報〉，《文物》，1981年第8期，頁1-10。

周洪才，《孔子故里著述考》，濟南：齊魯書社，2004。

胡平生，〈阜陽雙古堆漢簡與《孔子家語》〉，北京大學中國傳統文化研究中心，《國學研究》第7卷，2000。

孫欽善，《中國古文獻學史》，北京：中華書局，1994。

馬承源主編，《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馬國翰，《玉函山房輯佚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

國家文物局古文獻研究室、安徽省阜陽地區博物館阜陽漢簡整理組，〈阜陽漢簡簡介〉，《文物》，1983年第2期，頁21-23。

國家文物局古文獻研究室、河北省博物館、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定縣漢墓竹簡整理組，〈定縣40號漢墓出土竹簡簡介〉，《文物》，1981年第8期，頁11-13。

賀昌群，《魏晉清談思想初論》，北京：商務印書館，1999。

楊世文，〈宋代疑古思潮研究〉，《儒藏論壇》，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2004。

楊朝明，《儒家文獻與早期儒學研究》，濟南：齊魯書社，2002。

楊朝明，〈新出竹書與《論語》成書問題再認識〉，《中國哲學史》，2003第3期，頁32-39。收入黃懷信等主編，《儒家文獻研究》，濟南：齊魯書社，2004。

楊朝明，〈《中庸》成書問題新探〉，山東師範大學齊魯文化研究中心編，《齊魯文化研究》第3輯，濟南：山東文藝出版社，2004。

楊朝明，《孔子家語通解》，臺北：萬卷樓，2005。

楊朝明，〈讀《孔子家語》割記〉，《文史哲》，2006年第4期，頁43-51。

楊朝明，《出土文獻與儒家學術研究》，臺北：臺灣古籍出版社，2007。

鄭良樹，《諸子著作年代考》，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1。

韓兆琦，《史記箋證》，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4。

韓自強，《阜陽漢簡〈周易〉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

顧頡剛，〈孔子研究講義按語〉，《中國典籍與文化》第7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2。

龐樸，〈話說「五至三無」〉，《文史哲》，2004第1期，頁71-76。

The Compilation and Reliability of the *School Sayings of Confucius*

Yang Chaoming
Institute of Confucian Culture
Qufu Normal University, Shandong

Abstract

The School Sayings of Confucius (*K'ung-tzu chia-yü*) has long been disregarded as an apocryphal text. The discovery and study of excavated manuscripts now allows a reconsideration of its compilation and reliability. According to the *School Sayings*, Confucius's disciples arranged and recorded the text while the master was teaching; after hearing Confucius give a lesson, they would always "withdraw and record it." This is the earliest origin of the content in the *School Sayings*. After Confucius died, his descendent Tzu Ssu compiled both the *Analects* and his *School Sayings*. The term *chia-yü*, here translated as "School sayings," is a compound in which the meaning of *chia* is closely related to that found in the line "the disciples learned timely rituals in his school (*chia*)" and the *yü* means simply "discourse" or "speech." The *School Sayings of Confucius* can thus be understood as a collection of dictums or utterances from the School of Confucius.

After his disciples collected these sayings, a portion of their content was transmitted to the Western Han, via a process described by K'ung An-kuo in the postface to the text. K'ung An-kuo organized the material into the so-called *chuan-chi* compilation, which is the version of the text that exists today. This version was passed down through K'ung families until it came into the hands of Wang Su, who added a commentary and released a new edition which circulated widely. The text was thereafter revered by generations of Confucian students and collectors, and the subject of thorough and admiring scholarship. At the same time, over the long course of the transmission and study of Wang Su's edition, doubts and criticisms of the text gradually emerged, with some going so far as to label the entire text apocryphal. These doubts reached their apogee with the rise of the doubting antiquity movement, when the text was regarded as the quintessential example of an apocryphal work. The truth is that these doubts themselves have their own intellectual context, and when all the evidence is thoroughly and dispassionately reconsidered, their conclusions are difficult to sustain. The majority of the excavated material either directly or indirectly proves that this is a work of uncommon value. While the *School Sayings of Confucius* may bear the imprint of later editing and emendation, it originated from a genuine attempt to preserve the original teachings of Confucius himself.

Keywords: *School Sayings of Confucius*, textual origins, K'ung An-kuo, apocrypha, doubting antiquity movement